

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评析

孙新兴

内容提要 本文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占青岛时期在青岛实施的殖民教育和奴化归附教育,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以教育为侵略武器,在青岛培养殖民统治者,并且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最终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

关键词 日本侵占青岛 殖民教育 奴化归附教育

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曾于 1914—1922 年、1938—1945 年两度侵占青岛,在青岛实施殖民统治。期间,他们强行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和日本学校,对在青岛的日本人及其子女实施殖民教育,并通过为中国人设置的学校及汉奸政权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归附教育,妄图“以教育为殖民武器”^①,实现其最终吞并中国的野心。本文对其在青岛实施的殖民奴化教育,并通过殖民奴化教育做亡我中华的长远准备作如下概述和扼要评析。

一 日本在青岛设立的教育管理机构

(一) 直接由日本人掌管的教育管理机构

1. 守备军司令部设立的民政署学务系

^① 《胶澳商埠教育汇刊》1924 年 12 月,青岛市档案馆藏。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设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带有很强的军政色彩。1914 年 11 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占据德国在晚清时期割占的“租借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地域及矿山。嗣后,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视青岛为其永久殖民地”。^①他们无视中国对青岛的主权,赖在青岛不走,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在青岛驻扎军队和警察,建立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守备军司令部,向青岛移民,开设工商企业和学校。守备军司令部下设军政署和民政署,在民政署下设学务系,管理设在青岛的日本学校和为中国人设的学校,直至 1922 年 12 月将青岛归还中国。民政署的人员均由东京内务部直接派任。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把青岛当作海外殖民地对待了,此一时期在青岛实施的殖民地教育,与其在我国东北建立的“关东州”、“南满铁路附属地”等殖民地所实施的教育基本是一致的。

2. 日本驻青岛居留民团和领事馆

五四运动以后,日本迫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压力,于 1922 年很不情愿地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但乘机向中国政府勒索了一大笔“赎金”,并保留了许多特权。在 1923~1938 年的 16 年间,大量日本人仍留居青岛,其工商企业和学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由其居留民团和领事馆负责管理,“极力维持,并谋扩充之方策”。^②事实上,作为两次侵占青岛的过渡时期,这一期间日本对青岛的侵略挑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日本军队 5 次从青岛登陆,屠杀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侨民在青岛横行霸道,不断寻衅滋事;日本的特务机构遍布青岛,多不胜数;不少 1938 年以后在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从事奴化教育的日本人就是这一时期在青

① 《胶澳商埠教育汇刊》1924 年 12 月,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胶澳商埠教育汇刊》1924 年 12 月,青岛市档案馆藏。

岛的日本学校的要员。日本驻青领事馆和居留民团在上述这些侵略行径中都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其对日本学校的管理职能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日本投降。而对于日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成立的伪政权, 这两个机构则成为太上皇, 伪政权举行的重要会议、举办的重大活动, 每次都要“邀请”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人参加, 并作“重要”讲话。

3.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張所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 青岛在日本侵占区内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 成为日军的主要转运站及日本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工的重要输出港, 被其称为“中、日、‘满’三国之锁钥之地”^①, “华北之门户”。^② 因此日本侵略者从各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青岛的统治, 企图使青岛成为华北乃至所有沦陷区的“首善地区”和侵吞中国的主要基地。强化在青岛实施的殖民奴化教育, 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侵略统治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因此其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要甚于其他侵占地区。当时日本侵略者在青岛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張所”, 该机构直接受日本政府新设立的大东亚省和华北派遣军指挥部领导。兴亚院青岛出張所由驻青岛的日本海军、陆军和领事馆三方面人员组成, 1943 年并入日本驻青岛领事馆, 其下设官房、政务、经济、文化四部, 有关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事务由文化部主管。日本帝国主义从长远的侵略策略考虑, 这次没有直接出面进行殖民统治, 而是通过操纵汉奸傀儡政权控制着青岛的一切事务。

(二) 汉奸傀儡政权下设的教育管理机构

①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临字 23 全宗。

②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临字 18 全宗。

1938 年 1 月 17 日,日本侵略者伙同早就物色好了的一伙汉奸,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后又相继改称“青岛市公署”、“青岛市政府”。日本帝国主义推出的汉奸政权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汉奸政权经办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兴亚院青岛出張所的核准后才能通过,兴亚院的历任所长都是伪“治安维持会”和伪“市政府”当然的“顾问”。因此,伪政权及其相关团体的所作所为,均应视同日本侵略者的行径。青岛市伪政权下设的教育管理机构和相关团体如下:

1. 伪教育局(科)

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下设教育科,负责监管中国人学校,1939 年 1 月改称教育局。伪教育局(科)由汉奸挂名任局(科)长,日本人任副局长(顾问),其下属各科室也都安排了日本人担任副职,掌握实权,或干脆由日本人担任正职。如,伪督学室掌管着普及日语,审查修改教材,指导、监督、考察职员等重要职责,其主任由日本人担任,另设嘱 1 名、“教育指导官”27 名,均由日本人担任。整个督学室只有一个职位由汉奸充任。教育指导官多数是日本的中小学教员,经训练后派赴青岛的伪设中小学“指导”监督学校事务,掌握学校实权,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伪社会教育科掌管着文化、娱乐、新闻、宣传、宗教等事务,其科长最初由汉奸充任,1940 年改由日本副局长兼任。伪学务科科长由满族伪人员充任。伪庶务科调查股负责教育上的重要计划、审议、调查,教职员与学生的思想调查,教育法规的编纂等事务,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自 1943 年起,日本“副局长”改称“辅佐官”,并增设了 3 名日籍“专员”,列于各“科长”之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伪教育局的控制。此举一方面表现出日本侵略者对汉奸傀儡官员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们急于要踢开汉奸政权,把被侵占的中国领土直接

纳入其统治之下的急迫野心。

2. 伪学务委员会

1938年11月,日本侵略者操纵汉奸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由伪维持会总务部长姚作宾(后任伪青岛市长)任委员长,委员由日、伪政要10人组成,其中6人是日本人,并设日本顾问若干名。伪学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的把持下,表面上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议等形式向伪治安维持会提出报告并陈述意见,但实际上这些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張所批准才能生效。

3. 伪设青少年团体

日本侵略者还假手汉奸政权,成立伪青年团、伪少年团和伪少女团,胁迫中国学生参加。伪设青年、少年、少女团的要职同样也由日伪高级头目担任。如伪少年团的9个顾问中有6个是日本军政要人,名誉指导员由日军“宣抚官”和日本教师担任。日本侵略者操纵伪青年、少年、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①意欲使青岛的青少年成为“中日敦睦之先驱”。^②很显然,他们把从思想上彻底征服中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青少年身上,并把伪青年、少年、少女团作为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工具。

从伪教育局、伪教育委员会和伪青年、少年、少女团的人员构成及职责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二次侵占青岛时期,通过操纵汉奸傀儡政权,掌握青岛的教育实权,继续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以便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

① 《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联合协议会会议录》,青岛市档案馆H13A1048。

② 《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1938年11月,青岛市档案馆藏。

二 对日本人实施的殖民教育

(一) 日本人学校概况

日本自 1914 年开始向青岛大量移民,至 1919 年,在青岛定居的日本人猛增至 24500 余人。日本帝国主义用在屡次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长期经济掠夺中暴发的不义之财,在青岛建设了许多学校,培养他们的殖民统治者和第二代。这些学校大部分取得了日本文部省的“在外指定学校”资格,享受“恩准法”待遇,对在青岛的日本人及其子女实施殖民教育。至 1921 年,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总数达到 4446 人。1922 年青岛回归中国,但日本人继续居留并有所增加,所以这些学校继续留存,仍为日本文部省的“在外指定学校”并继续享受“恩准法”待遇。1938 年 1 月,日本帝国主义再度侵占青岛之后,移居青岛的日本人再次骤增,其学校和学生数也随之增加。自 1914 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其在青岛的学校对日本人进行的殖民教育一直没有中止过。

日本侵占当局对其在青岛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凡有日本移民聚居的地方,都设立了小学。自 1915 年至 1918 年,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共设立了 3 所小学和 2 所中学。日本第一小学校在市区及胶济铁路沿线主要站点、矿山还设立了 8 处分校。1921 年,上述学校共有小学生 2640 人,中学生 737 人,在日本人中基本普及了中小学教育。此外,还有 2 所幼儿园。1923 年第一小学的四方、沧口两所分校分别独立。1938 年,随着日本人大量涌入青岛,又建立了青岛第三普通高等小学校。日本人对其在青岛的移民学校不惜投入巨资,每年支出的基础教育经费约 50 万日元。(1922 年他们以胶济铁路向中国勒索的赎金为 4000 万日元)1916 年建成的日本高等女学校(相当于高中)校舍耗资 40 余万日元,其“外表

壮观,设备完善,内容充实”。此后建成的日本(男子)中学校校舍耗资45万余日元,其“外观之宏伟,在我国(指日本)中学中极为罕见”。^①直至今日,当年日本男、女中学的校舍还一直被青岛的两所高等学校使用着,并不显得过时。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对其殖民地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由于1922年日本被迫将青岛归还给中国,所以原定在青岛设立高等学校的计划未能实施,其子女高中毕业后,需回日本接受高等教育。

日本初占青岛后,急需翻译人才。为适应这种急需,培养殖民统治工具,日本侵占当局于1915年2月创办了中国语学校,此后又在胶济铁路沿线的坊子、张店、青州设立分校。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该校停办。

1916年3月,紧随日本侵略军的步伐,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私立青岛学院开张。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学制分三种:本科3年,授甲种商业学校课程;高等科1年,授专门(职业)学校课程;专修科2年,设日语、汉语和英语。该校从创办伊始,就受到日本侵占当局的支持和关照,其教师多由日守备军司令部的官员兼任,经费主要来自日本财团的资助。实际上,这是一所半官办性质的学校。1921年该学院按照日本学制,增设甲种商业学校,学制4年。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该学院继续留存,增设实业学校、女校,均为中等职业性质,并取得了日本政府规定的在外指定学校资格,享受“恩准法”待遇,规模日益扩大,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第一次日占青岛时期,在中国语学校学习的大部分是供职于日本军政当局军队、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日本人,而在青岛学院学习的除上述人员外,主要是日本的初中、小学毕业生,继续学

① [日]《青岛案内》1935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习汉语并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被分派到日本驻青军队、机关、企事业单位任职。此外,日本高等女学校的前 6 届学生均提前毕业,也被分派到上述部门任汉语翻译,以应急需。

(二) 对日本人实施的殖民教育概况

像在其国内一样,日本在青岛的学校以日本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教育宗旨,要求学生每日恭诵,身体力行,意在培养“克忠克孝”,“时守国法”、“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忠良臣民”。《教育敕语》不仅作为日本国内教育的总纲领,也为在青岛实施殖民地教育提供了基本的理念。日本统治者把封建伦理道德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以及日本的皇权神话拼凑在一起,作为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规范,集于天皇一人身上,把天皇作为这种道德的化身;把忠于天皇、遵守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法”、为天皇献身,作为教育日本国民的金科玉律,使之成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① 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皇道精神来教育他们在海外的子民,从而实现其“扶翼皇运”的目的。所谓“皇运”,即“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② 说白了,就是以武力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建立横跨东亚的“大日本帝国”。因此,日本在青岛的学校强化对其学生的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强调忠君爱国、尚武献身,向学生灌输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对他们进行武装军事训练。日本侵略者在青岛设立阵亡日军将士“忠魂碑”和日本神社,供在青岛的日本人参拜景仰,以此培养他们的“爱国”献身精神。

语言障碍是日本侵略者侵占青岛后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语言教育被日本侵占当局列为对日本人进行殖民教育中的重要

① 《教育敕语》,〔日〕内阁官报局编《明治年间法令全书》,明治二十三、二十四年。

②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 1964 年版,第 150 页。

事项。“对于移居的日本人来说,学会当地语言至关重要,一般日本人熟悉中国语言的话,对殖民地的经营会有好处,这在其它国家早有显见的例子”。^①日本侵略者清楚地认识到当地语言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其侵占初期,特别重视对日本人的汉语教育,教授汉语的日本学校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除在成年日本人中进行速成式的汉语教育外,还把汉语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在职业学校中强化汉语教学,以便他们的下一代将来能在青岛扎根生长,并从青岛出发,征服中国,征服东亚。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为日本人设立学校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急需,满足其对青岛进行殖民统治的急需;二是为了解决在青岛定居的日本人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以便把他们培养成能为天皇和帝国黷武献身的“忠良臣民”。这些第二代“忠良臣民”与其在国内的臣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必须精通汉语并且具备较高素质,能长期在青岛居住,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青岛,把青岛变成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的需要。

三 对中国人实施的奴化教育

日本侵占青岛时期,一方面对中国原有的文化、教育大肆破坏,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学校,招收少量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成年人进行奴化教育,以期达到长期奴役中华民族,“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与日本侵略者高度重视其子女教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对中国青少年的教育尽量减少学校

^① [日]伊豆井敬治著:《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满铁总裁室地方残务部整理委员会,1939年版,第380页。

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在教育思想方面,日本侵略者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方针,向青岛的青少年灌输日本的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精神和附日卖国思想,强迫他们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妄图泯灭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从语言、思想、习惯上“日本化”,成为其二等臣民。在办学条件方面,则是因陋就简,极少投入,充分体现了殖民地教育的特征。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做法,是他们在朝鲜、台湾、“关东州”、伪满洲国的故伎重演。

(一) 为中国人设立的学校概况

1. 基础教育学校和师范学校

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为中国人设立了 37 所公学堂(相当于小学),共有学生 3036 人,平均每校仅 85 人。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国人来说,能在公学堂就学的适龄儿童,无异晨星之寥。这些公学堂大多是由旧私塾改成的,规模很小,校舍是普通农舍、祠堂或庙宇,设备简陋,师资水平低下,学制仅为 5 年,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育水平和教育年限,与同时期的日本小学相比,均有天壤之别。当时日本侵占当局为中国青少年设立的学校仅此而已。公学堂的教科书采用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教育研究会编纂的课本。南满铁路附属地教育研究会是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殖民地的教育管理机构,青岛的公学堂采用其编纂的课本,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把青岛也视作像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样的殖民地,像对待那里的中国青少年一样对青岛的青少年实施奴化归附教育。

抗日战争以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 112 所,国立山东大学、市立(男子)中学、市立女子中学、中等师范学校、农业职业学校和胶济铁路中学各一所。抗战开始后,这些学校全部解散。日本再次侵占青岛后,强制恢复了部分市立小学和市立男、女中学。日本侵

略者在学校中强派日本副校长或“教育指导官”掌握学校实权,实施奴化教育。整个日本二次侵占时期,全市小学数量最多达到 80 余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与抗战前的水平相差很大。战前市区原有市立小学 25 所,日伪仅恢复了 5 所。师范学校迟至 1941 年才易地重设。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它用。例如,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而这两所小学自然是得不到恢复了。许多小学由于校舍被日军占用,只得租用民房勉强敷衍,且采取二部制上课。

日本侵略者有意不使中国人受到高等教育。德国侵占青岛时期,曾与中国政府合办一所德华高等学堂,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被迫停办。日本二次侵占以后,对于抗战前国民政府设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始终不予恢复,并以肃清“抗日”为借口,阻挠铁路中学及其他一些学校复课。

出于培养奴化教育所需师资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对中等师范教育较为重视。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之后,许多有民族气节的中小学教师拒绝到伪设学校教书。日伪急需小学教师,遂于 1938 年底至 1940 年在伪设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学制仅为 1 年。特别师范科设教育部长和日语教员各一人,均系日本人。1941 年又单设伪市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任副校长,掌握实权。伪设市立中学特别师范科和市立师范学校的课程主要为日语,并向学生灌输奴化教育思想。特别师范科《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国民)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

之弊害至为要务”。^① 经过一番“洗脑”和日语强化训练, 伪设市立中学特别师范科和市立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都被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分派到各中小学。

日本侵占青岛之前, 西方基督教在青岛设立了许多教会学校, 招收中国青少年。这些学校办学水平相对较高, 并设有高中, 教学设施、师资状况也较好。这些教会学校的所属国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日益扩张, 日本侵占当局对这些学校也抱有戒心。1919 年, 由北美长老会设立的明德中学学生因响应五四爱国运动, 反对日本强占青岛, 遭到日本军政当局逮捕, 明德中学也因“妨碍治安之嫌”^② 而被勒令停课一年。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 3 所中学和 3 所小学, 1944 年又将这些学校及与英美教会关系密切的 3 所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改为伪设市立学校, 以便于控制。

2. 日语学校和职业教育学校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 在个别公学堂附设实业班, 少量学生毕业后可在实业班接受 3 年以内的商、农、工等职业教育, 并强化日语教育。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想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中国学生, 其农、工科实业班形同虚设。当时青岛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输出、输入港, 所以商科实业班也只能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适用工具而已。此外, 还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了 5 所日语学校, 在济南设立东文学校。1935 年东文学校由济南迁至青岛, 改名私立东文书院, 设中学部和夜学部, 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 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

① 《青岛教育周刊》第 1 卷, 1938 年, 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日] 青岛守备军民政署编:《青岛要览》, 东京新极东社出版部 1921 年版。

日本的私立青岛学院也兼收中国学生。1922年以后,日本在青岛不再急需汉语翻译了,因此青岛学院开始日、中学生兼收,以期把中国学生培养成能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特别是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该校更成为日本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的得力工具。青岛学院下设的“八 一 宇女校”,专收中国学生,其校名公开以日本提倡的八 一 宇精神命名。1941年日本在台湾成立的“皇民奉公会”的行动纲领提出:使中国人的“汉族性要蜕变成为日本民族性”,从而“实现惟神之道,八 一 宇精神”。^①由此可见青岛学院在对青岛青少年进行的奴化归附教育中担当的角色。

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市区的5所小学内分别设立3处日语补习学校和2处商业补习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夜间授课。日语补习学校设修身、日语课,商业补习学校设修身、日语、商业要项、簿记等课程。日本侵略者还支持一些在青岛的日本人开设了许多日语学校,招收中国青少年。

尽管日本侵略者口称要培养小学毕业生的谋生能力,但他们为中国青少年设立职业学校和日语学校的首要目的仍然是进行奴化归附教育,其主要课程是日语。如日语补习学校和商业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分别声称要“谋中日亲善”和“陶冶其(指学生)亲日思想”。^②其另一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懂日语可供其驱使的适用奴才。日语学校自不必说,在商业补习学校里,他们最为注重的仍然是学生的日语能力,其次才是商业技能,以适应他们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的需要。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先进工业技术,则根本不传授给中国学生。

(二) 奴化归附教育概况

①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初等教育研究》,台湾瑞和堂1981年版。

② 《青岛教育半月刊》第1卷,1940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1. 强制实施日语教育

日本的奴化归附教育首先体现在对中国人强制实施日语教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史上,其军队每侵占一个地方,紧接着就在那里强迫实施日语教育,青岛也不例外。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他们仿照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做法,规定青岛的公学堂主要课程为日语,并通过所设的日语学校对其他中国人进行日语教育。

日本二次侵占后,又在各级各类学校重设日语课,由日本教育指导官亲自任教。根据日伪规定,小学各年级每周学习日语的时间为 60—90 分钟,中学 4 课时,特别师范科 12 课时。但实际授课时间远不止这些。日本侵略者还逼令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使用日语。学生见了日本教官必须用日语问好,教唱的歌曲也多是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歌曲,课堂用语要用日语,甚至连喊操也要用日语。伪教育局规定,各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日语比赛,每学年举行一次日语学艺会,并印刷或绘制日文识字图画,张贴于各校。至于名目繁多的日语雄辩会、日语演讲会、日语作文比赛、日语作文展览、日语歌舞会等,更是频频举办,多不暇接。与此同时,他们极力压缩其他学科——特别是国语和史地学科的课时,以降低青少年的文化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市立中学特别师范科国语被压缩至每周 4 课时,普通中小学的其他课程经常被日语挤占。

日本统治者最重视的是日语课,伪教育局督学室的首要职责就是“奖励与普及日语事项”。^①日本教育指导官对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不管不问,但日语不好便大发雷霆。日伪经常派人到学校调查日语学习情况,稍不如意,即严加训斥。伪教育局长陈命凡在全市校长会议上恫吓说:“将来举行日语发表比赛会时,如果

^① 《青岛教育周刊》第 2 卷第 40 期,1939 年 10 月,青岛市档案馆藏。

有成绩毫无者,该科教员及该校校长应同负责任。”^① 每年兴亚院青岛出張所还函令伪市公署出资,抽调日籍教员赴北京参加伪华北政府举办的日语教育讲习会,以提高其教学水平。

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各种成人学校、职业学校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实施日语教育。两次日占时期所设的日语学校和商业学校,都是出于这一目的。日本人设立的青岛学院下设的3所学校,更是实施日语教育,使中国人“同化”于日本的极好基地。不少伪职人员就曾在上述学校及设在青岛的其他日本学校就学过。此外,第二次日占时期,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临时举办的假期日语学校等,也都以对中国人教授日语为主旨。

东文书院也是日本侵略者教授日语、实施奴化归附教育的重要场所。该校在济南时,就设实修科和日语速成科,“专为胶济铁路造成应用之编译及杂项人才”。^② 迁至青岛后,由汉奸李仲刚任校长,教授日语和文言文。1938年以后,更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③,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伪市长姚作宾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其中学部以日语和文言文为主,连《古文观止》这样的中国古籍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有日籍教师8人,中国籍教师5人,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并增设日语研究科。东文书院忠实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得到兴亚院青岛出張所、日本居留民团和伪

① 《青岛教育半月刊》第1卷第6期第48页,1941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中国年鉴》1924年出版。

③ 《青岛教育周刊》1938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市政府的经济资助,李仲刚也因此而充当了伪市政委员。

为加速普及日语教育,日本侵略者逼迫中小学教师学习日语,由各校日本指导官和日语教员任教,以期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他们在举办的全市中小学教员假期讲习班中设置日语课,平时以“日语研究会”的形式,每周学习日语 2 小时。日伪还在小学教员中举办“日语唱歌及舞蹈研究会”,希图“以研究日本唱歌及学生舞蹈为辅助普及日语教育之工具”^①,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艺术熏染的方法使中国的儿童少年日本化。

日本侵略者在伪设学校方面极少花钱,然而在实施日语教育方面却慷慨大方。如 1940 年 2 月,兴亚院青岛出張所所长多田武雄以“华北文化事业协会青岛支部部长”的名义,向伪市公署提供该年度第二次日语教师补助金 5000 元。同年 10 月至翌年 5 月,该协会青岛支部三次向伪市公署“赠送”日文图书 1677 册,并出资“援助”编辑《小学儿童日本语作文集》,所赠图书全部被分派到伪设图书馆、“新民教育馆”和市区各中小学。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也向青岛的伪政权赠送了一批“介绍日本文化之图书”。伪教育局也在《青岛教育周刊》上开辟专栏,刊载学生日语作文。

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学校中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而且还一切可能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中推行日语教育,以期从语言和习惯上“同化”中国人。日伪首先在伪职人员中推行日语教育。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工具,日本侵略者必须首先使他们日本化,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主子卖命,使其成为所谓“民众代表”。^②同时“言语互通、情感相应”^③,也便于驱使。因此他们在伪政权成立之初,即在伪

① 《青岛教育半月刊》第 1 卷第 13 期第 18 页,1940 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青岛特别市公署民国 30 年 12 月工作报告·总务》,青岛市档案馆 B132A805。

③ 《青岛特别市公署民国 28 年 6 月工作报告·警察》,青岛市档案馆 B132A785。

职人员中提倡、奖励学习日语,大力制造以学习日语为荣的气氛。他们“参照日本警察及宪兵队之成例及满洲国之奖励规程”,制订了《日本语学奖励规则》,规定每年举办两次日本语学试验,所有伪机关的职员及“同等待遇”者,“均得依本规则受日本语学试验,合格者(按月)给予津贴及徽章”,合格有效期满后,“得应第二次试验”。^①在此命令督迫及重金利诱下,伪职人员纷纷参加日语试验。为了尽快使伪职人员学会日语,时任伪教育局嘱 的日本人冈田瓢也在其个人设立的华文书院招收伪职人员教授日语,要求各伪设机关派人参加。日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为装点门面,恢复了前国民政府为妓女设立的两所补习学校,又新设了一所“游民感化所”。就连这样的地方,也派设了日籍日语教员,足见其推行日语教育无孔不入,其迫不及待地“同化”中国人的心情已暴露无遗。

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虽然没有像在伪满洲国那样公开将日语尊为“国语”,在教科书中采用半中半日的“协和语”,但也在一些伪政府的行文、发行的一些书刊及广播、宣传中,偷梁换柱地掺杂上一些日语词,如交欢(联欢)、主催(主办)、开催(开办)、合同(联合)、生徒(学生)、厚生科(社会福利科)……等。在有些行文中,甚至直接使用日文的片假名代替汉字。应该指出的是,日伪在中文中掺杂日语词,不同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吸收、借用日语词的做法。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人是主动地、自愿地吸收和借用日语词的,而日伪则是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其次,新文化运动时吸收、借用的日语词主要是汉语里面原来没有或难以用原有的词表达现有意义的词,而日伪在中文里面掺杂的日语词则是中文里面早已存在而由他们硬性替换的。尽管这

① 《青岛特别市公署训令第 1081 号、附件》1939 年 3 月 22 日,青岛市档案馆临 23- 1- 52。

只是一个肇端,但我们不难想象,假如抗日战争的局势向着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当他们取得了对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绝对控制权以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朝鲜、台湾、伪“满洲国”就是前车之鉴。

关于开设日语课的目的,“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早在 1911 年的关东州学事咨询会上就说得明确:“公学堂……应特别注重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指中国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大连公学堂堂长也强调把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从而使中国人“对日本更加亲善,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①他们所说的“同化”,并不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相互融合的同化,而是由他们单方面强制实施的同化,实际上就是奴化,或者说是“日本化”。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地对中国人强迫实施日语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让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淡忘自己祖国的语言,逐渐从语言上日本化,并通过学习日本语言,潜移默化地接受日本文化和日本的思想价值观念,进而归顺“大日本帝国”。

2. 编造谎言,灌输附日卖国思想

日本侵略者在强化日语教育的同时,极力向中国师生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并编造谎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泯灭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意识。1938 年初,日本侵略者假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之口发布训令:“过去国民政府所施行之教育以党化为方针,以排日为手段,驯致引起此次之事变(指七七事变)。此后对于党化排日之教育亟应严加取缔。”^②他们肆意篡改教科书,删去书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权的内容,换上“中日亲善,共存共

① [日]岛田道弥:《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出版 1935 年版。

② 《青岛教育周刊》第 1 卷第 2 期,1938 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荣”、“同文同种”、“中日满一体”、“日本皇军来解救中国人民”之类的鬼话,把伪满洲国说成是合法的独立国家,中国人是“侵略者”。他们还成立儿童读物审议会,销毁抗日进步书刊和与其谎言不一致的书刊,编撰以奴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读物。

日本侵略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对学生进行奴化归附教育。当时所有学校的校训、校歌中都羈进了“亲仁善邻”、“兴亚重任在新民”之类的鬼话。每逢日本重大节日或日军攻陷中国重要城市,他们都要胁迫学生参加集会游行,以示“庆祝”。日伪频频举办名目繁多的学生演讲会、雄辩会、歌舞比赛、作文比赛、作品展览……等,在伪办教育刊物上开辟学生作文专栏,诱迫学生发表附日卖国言论,以“考验学生思想”,“使其归于正确”。^①他们通过举办中日学生“联谊会”、运动会,参观在青岛的日本学校,让日本学生在中国学生面前逞能,以挫伤中国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选派个别中国学生赴日本参观,回来后令其四处宣传“大日本帝国”如何“强盛”及中日亲善的必要性,泯灭中国青少年的民族意识。日本侵略者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即把中国青少年驯化成其二等臣民,既要乖乖地听其奴役驱使,又要对其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主子地位。

日本侵略者清楚地知道,要对学生进行奴化归附教育,首先得使教师从思想上归顺他们。“最迫切而最重要、能直接影响学生之知识与行为者,厥为师资问题……最迫切而最重要、能直接影响教师之动作与教学者,厥为思想问题”。^②因此对于中国教师极力进行“思想肃正”,向他们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妄图使他们成为对学生

① 《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4期29页,1938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日本武田熙语,载《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期第4页,1939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到伪青岛市政府(伪治安维持会),频繁地举办各种名目的教职员讲谈会、讲习班、“恳谈会”、“联谊会”,胁迫教师参加。每次会、班都有“中外(日本)各长官、各机关团体领袖”“莅场指导”,以主子的身份当面训斥中国教师,命令中国教师按他们的旨意向学生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和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各种讲习会、班“尤注重于精神训话”。^① 1938 年,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宣称:“各教职员前在国民政府指挥下,熏陶濡染,均沾有党化。为阐明新民教育,屏绝邪说起见,一律登记,从严审查合格之后,开设训练班,指派本会重要职员并敦请当地名流及友邦教育人士轮流讲演,切实训练”^②,以使他们“根绝党化谬误思想”,“实行中日亲善”。^③ 是年 8 月伪维持会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开幕时,发表演讲者全是日本人。日本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开幕和闭幕时均到场以主子的身份“致词勸勉”:“国民党过去之排日教育,实系一种浅见,而不合乎于正义之举动”,“赖诸位以养成最纯正之第二代国民”。^④ 大鹰如此指摘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十足显示出日本侵略者蛮横的强盗面目和对中国进行的思想、教育侵略;至于他所说的“纯正之第二代国民”,当然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甘心归附日本侵略者而毫无反抗意识的“忠良”奴才了。讲习会上的一切所讲所做,目的只有一个——“肃正”教师的思想,使他们乖乖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服务。日伪还经常举办“中日教员

① 《青岛教育半月刊》第 1 卷第 14 期第 10 页,1941 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青岛特别市治安维持会行政纪要汇编·教育行政》,1939 年 1 月,青岛市档案馆 B132A 796。

③ 陈命凡在讲习班上的讲话,《青岛教育周刊》第 1 卷第 16 期 56 页,1938 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④ 《青岛教育周刊》第 1 卷第 16 期第 89 页,1938 年。

愚谈会”，“并有游艺以助余兴”^①，妄图以此笼络中国教师的感情，使他们甘心归顺侵略者并成为其实施奴化教育的帮凶。

3. 灌输封建法西斯思想，实行血腥法西斯统治

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封建法西斯思想塑造学生的奴性，磨灭他们的反抗精神。这种封建法西斯思想是中国原有的封建伦理道德与日本近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在日本第一次侵占之时，即按照《教育敕语》的精神，规定公学堂必须贯彻它的教育宗旨和教学计划，通过设“修身”课等手段对学生进行封建法西斯教育。当其卷土重来时，网罗的汉奸多是顽固坚持封建思想的民族败类。主子奴才，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他们把战前的公民课再度改为修身课，大肆鼓吹儒学发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他们打着恢复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的幌子，通过汉奸之口叫嚷要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就要学习日本，实行“圣道”，声称要“以中国固有之五伦八德为中心，融合日本近代文化”为教育方针。^②日伪所说的发扬光大于日本的儒学和“圣道”，并不是孔子思想的真谛，而是经过阉割篡改后，符合他们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需要的封建法西斯伦理道德，既与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又揉进近代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观念，这在《教育敕语》中有极精要的阐述。所谓“日本近代文化”，其核心也是《教育敕语》所述的“皇运”和“皇道”精神，是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物。中国长期封建统治中形成的封建伦理道德正符合日本侵略者的口味，他们要以在日本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搀和在一起，对青少年进行思想统治，企图把他们

① 《1938年青岛特别市公署行政年鉴·教育》，首都图书馆藏。

② 《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3期第1页，1938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培养成逆来顺受、驯服顺从并死心塌地为之卖命的奴才。他们在学校中极力向师生灌输这两种封建思想的混合物,教育学生“尊孔读经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①他们恢复每年春秋祭孔典礼,胁迫师生参加,命令学校以供奉孔子圣像取代孙中山画像。一时间,长袍马褂,拈香读经,封建沉渣泛起,乌烟瘴气弥天。每星期一早晨,各校校长都要在日本副校长或教育指导官的监督下对师生进行精神训话,重申“亲善”滥调;对师生进行“皇道”精神教育,逼迫师生面向东方,向日本天皇“遥拜致敬”。他们还经常胁迫学生“慰问”日军,到青岛的日本神社参加阵亡日军“慰灵祭”,参拜在青岛的日本“忠魂碑”,向青少年大肆灌输武士道精神和日军是为“解救”中国人民而“牺牲”的观念,把在侵略战争中充当炮灰的阵亡日军当成英雄,让中国学生对他们产生负罪感和崇敬感。当时所有的校训、校歌中都充满了“忠孝仁义”,“亲仁善邻”等词语,如同日本《教育敕语》的翻版。

日本侵略者的这种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赤裸裸地体现在对中国师生的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上。他们不仅在思想上禁锢师生的言行,而且在肉体上对中国师生横施暴虐,妄图以血腥恐怖手段逼迫中国师生就范。在其第一次侵占时期,公学堂的校规极严,“学生偶有过失,则鞭笞立加。至于拳击足踢,尤属常事。”^②当其卷土重来后,则通过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严密监视控制师生思想行动,教师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否则就要遭到训斥打骂。在日伪统治的学校里,等级森严,学生没有任何人格和尊严可言。教师可以任意打骂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骂低年级的学生,日本学生可以任意欺侮中国学生,被欺凌者不许

① 《青岛教育周刊》第 2 卷 47 期第 9 页,青岛市档案馆藏。

② 阮湘等编:《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 年版。

有任何辩解和反抗,否则就要遭到更残暴的凌辱和体罚。他们公开叫嚷要“恩威并用,显示皇军威力”^①,禁止师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伪教育局多次转发伪华北教育部训令:“所有各级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勿得舆闻外事。倘有列身党籍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者,应由各该校校长随时查禁。”^②先后担任过伪教育局顾问、督学室主任的宇野 四郎也露骨地说:“学生应守学生的本分,如果逾越规矩,是断难容恕的”,“希望各校当局严切注意,务使青岛学生人人俱听教导,守本分。”^③师生稍一流露出不满情绪,即遭逮捕,残酷镇压迫害,甚至被处死。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要求抗日、支持抗日的行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迟迟不许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致使2人死亡,多人致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遂将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1944年3月20日夜,日本宪兵队和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数十名中学教职员的家中,硬说他们是抗日仇伪的“危险分子”,带至宪兵队严刑拷打,致死多人。有一中学教员经常叹气,被宪兵队认为是“思想犯”而逮捕。在1943年举行的全市日语竞赛会上,私立圣功女中的学生林雅珍在演讲中略微提到“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在场的兴亚院头目赫然大怒,扬言要从严惩处,后来得知她是伪驻日公使林耕宇的女儿,才不再深究。

日本侵略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青岛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反抗。在青岛附近的农村地区,活跃着多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部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② 《青岛教育半月刊》第1卷第1期第17页,1940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③ 《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期第12页,1939年,青岛市档案馆藏。

支抗日游击队, 伪设小学难以建立。即使建立了, 或者难以招生, 或者成为表面上敷衍日寇, 暗地里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的“两面学校”。私塾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 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 已逐渐趋于消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 青岛的私塾却大量增加, 虽经日伪多次取缔, 却有增无减,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人民群众不愿把子女送到伪设学校接受奴化教育。1938 年底日伪在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广发伪设市立中学特别师范科《招生简章》。尽管《简章》中规定“除不收学费外, 并供给学生宿舍及发给所定之饭费”, 这在当时不啻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但“报名投考者不甚踊跃”^①, 原定招生 80 人, 实际只录取了 28 人, 只得从已有教员中选取 12 人, 勉强凑足一个班。

四 结束语

综观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占青岛时期的教育状况, 其殖民地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他们把在其统治下的青岛教育分成两部分: 为侵略者设置的教育和为被侵略者设置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直接设置教育机构和控制伪教育机构, 对这两部分教育采取截然不同的教育态度和措施。他们对为侵略者设置的教育——即为其本国人设置的殖民教育备加重视, 务求精良完备, 给予受教育者优厚待遇, 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素质和在被他们侵占的土地上尽快适应并生存发展的本领, 成为在青岛的第二代移民, 以便其在青岛长期统治下去, 并以此为基地, 进而吞并全中国。而为被侵略者设置的教育——即为中国人设置的奴化归附教育, 则故意降低教育质量, 缩短学制, 降低办学层次、课程

^① 《青岛教育周刊》第 1 卷, 1938 年, 青岛市档案馆藏。

程度和办学条件,使中国青少年虽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以便供其役使。同时编造谎言,篡改历史、地理知识,压缩国语课时,强迫实施日语教育,向中国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思想观念和附日卖国思想,对被教育者进行奴化归附教育,并辅之以残暴的封建法西斯手段来制服中国学生,以期泯灭中国青少年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进而把他们驯化成“大日本帝国”的二等臣民,任其长期统治,在适当的时候归顺于“大日本帝国”。关于“归顺”这一点,曾在台湾总督府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下野后公开向台湾学生挑明:“汝曹如欲求与三千年来忠诚于皇国(指日本)的母国人(指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应以今后 80 年为期,努力同化与母国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别亦莫如之何,勿鸣不平。”^①由此可以佐证,日本在青岛推行的殖民地教育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灭亡中国的长期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将日本在青岛推行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与历史上日本在中国乃至亚洲各殖民地的一些相似的做法相互联系和对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外殖民地长期推行的殖民地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

(作者孙新兴,1950年生,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① 张正昌:《林献堂与台湾民族运动》,台北自刊,第16页。